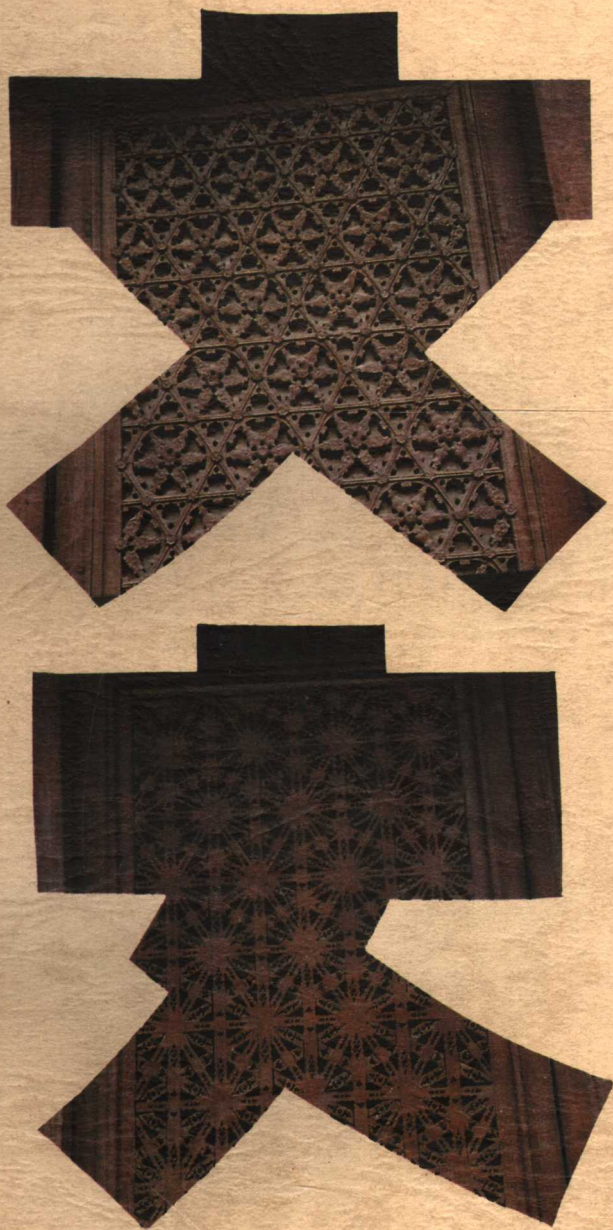


北京文史资料

第62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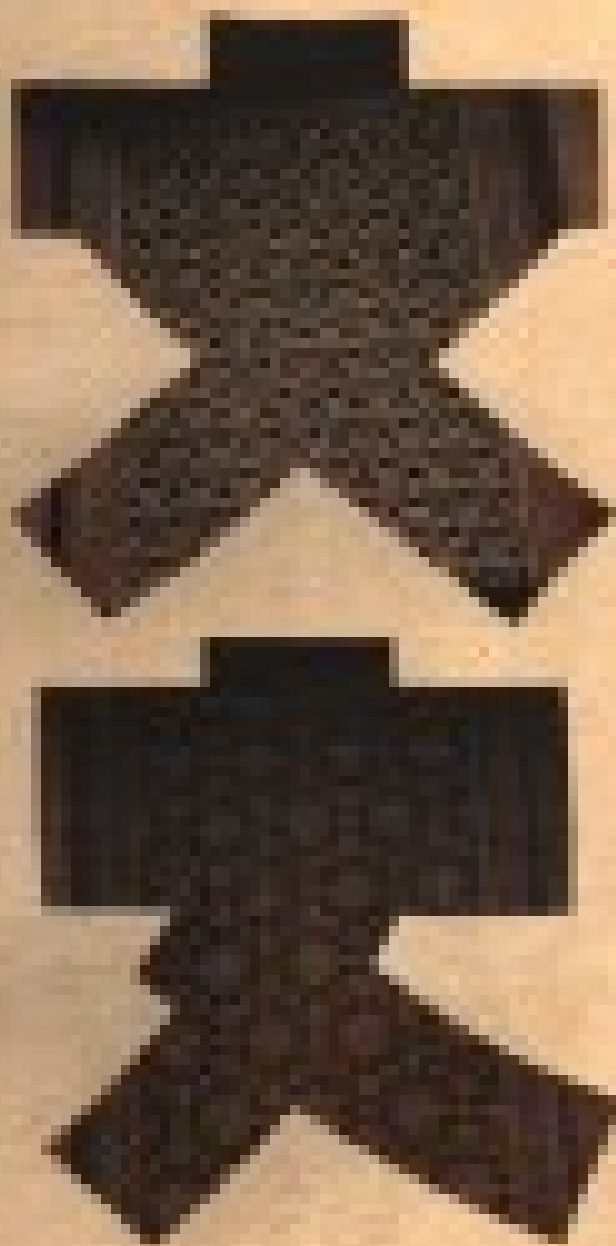


▲ 外交家翻译家柯柏年
▲ 台胞与北京

▲ 清朝王公府第（一）
▲ 一百年前被围困的外国使馆

北京文史资料

第四期



▲ 北京文史资料第四期目录
▲ 北京文史资料第四期封面设计
▲ 北京文史资料第四期封底设计
▲ 北京文史资料第四期封套设计

北京文史资料

第62辑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史资料. 第 62 辑/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ISBN 7-200-04189-0

I. 北… II. 北… III. 文史资料—北京市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882 号

北京文史资料

BEIJING WENSHI ZILIAO

第 62 辑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瀛洲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237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200-04189-0

K·435 定价: 16.00 元

《北京文史资料》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舒 乙

编委会副主任：弥松颐 贾凯林

陶信成

编委会委员：王灿炽 李 牲

李滨声 李 张 洁

陈平原 郑 潜

赵其昌 谢 方

蔡美彪 戴 贤

张秋萍

本辑执行编委：郑 潜

本辑执行编辑：秦 薇



· 往事追忆 ·

- 1 老一代领导人对新华社工作的关怀 叶 周

· 人物春秋 ·

- 10 外交家翻译家柯柏年 陶 涵
19 怀念先母傅文郁 刘衡玑
37 郭可诤生平事略 高 琨
46 记儿童教育家孙敬修 李友唐

· 文化轶闻 ·

- 60 《大公报》纪事 王 鹏
87 “公理战胜”牌坊与先父许宝衡 许恪儒

· 史事钩沉 ·

- 91 台胞与北京 房建昌

· 王府史话 ·

- 141 清朝王公府第（一） 冯其利
207 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及其王府 白荫泰

· 梨园述往 ·

- 216 老北京的京剧票房 白宝华
233 载涛先生二三事 凌恩岳
237 刘光启先生谈京剧前辈逸事 于 森

附：韩慎先（夏山楼主）唱片目录

244 韩世昌赴日演出始末

朱 复

248 言菊朋艺事年表

张伟品

· 老照片 ·

274 一百年前被围困的外国使馆（九幅）

王毓华提供

281 程砚秋游西山

张寿崇提供

284 尚小云和荣春社科班学生

于 森提供

285 马连良、韩慎先、谭富英等合影

于 森提供

286 章遏云等《乾坤福寿镜》剧照

于 森提供

287 编者的话

289 《北京文史资料》第 58 辑勘误

老一代领导人对新华社工作的关怀

·叶 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年了，这 50 年也是新华社成长壮大的 50 年，它由党的通讯社发展成为国家通讯社，并建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这 50 年中我先后在总社对外部和国际部工作，在国外分社和国内分社任记者，并担任了 8 年的干部培训工作，亲身经历了新华社的这一段发展过程。我深深地体会到，新华社的发展与党中央的领导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关怀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建国初期以及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两次担任中央外事记者，有机会同中央领导同志接触，感受到他们是非常关心和支持新华社的工作的。这些经历是我终生难忘的。

同毛主席握手

1950 年 9 月 30 日晚 7 时半，我拿着毛泽东主席的大红请柬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国庆招待会。

入口处已排成一条长队，一个挨一个地向前走着。快到大厅门前时，我发现了身兼国家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乔冠华和主任张经武、中央典礼局局长余心清等正在同人们一一握手。乔冠华同我握手后轻声地对我说：“毛主席在里面，你要同他握手了。”我抬头一看，惊讶地看到就在门厅里站着身材高大的毛主席，他的身旁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处长阎宝航、副处长王倬如和交际科科长韩叙。他们正向主席一一介绍来宾。我立时感到心在砰砰地激烈跳动。当听到韩科长向主席说“新华社记者叶周”时，主席的大手已经伸过来了，我赶忙握住，连声说：“主席身体好！”毛主席微笑地看着我，点了点头。这几秒钟的时间使我万分兴奋，在大厅里我找到了范长江、陈克寒、黄操良等围坐的那张桌子，在他们身旁坐下。

以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名义举行的正式国宴的次数是很少的，因为后来国庆招待会是以政务院（国务院）周总理的名义举行了。

少奇同志用专车为记者送稿

1949年冬初的一天，亚洲、太平洋工会代表大会要闭幕了，闭幕式开始之前，我已拿到主要的文件，准备送回国会街（新华社所在地），预先打字、做孔，等文件一通过，我再用电电话通知播发，这样可以争取时间。我从中南海怀仁堂走出来就傻眼了。送我去的车子到得早，停在车场的最里面，停车场已停满了车，无法开出来。我焦急万分。正在这时，一辆苏制大型吉斯轿车在门口停下，刘少奇副主席从车上下来，他走过我身边时，向我点了点头。他刚要走进怀仁堂，注意到我正在焦急地同交警交涉，便停了下来，关切地问我：“记者同志，有什么问题呀？”我本来同少奇同志不熟，可就在7个小时前，即凌晨两点，彭真和刘宁一同志将我介绍给少奇同志。这是因为我帮助解决了一个难题，从世界工联主席赛

扬的秘书那里搞到一份赛扬的总结报告，了解了世界工联主席团对我国工会代表团提出的工会工作意见的基本态度。不少中央领导人参加了对策研究会以保证大会顺利闭幕。少奇同志（中华总工会名誉主席）在半夜后也赶来参加会议。彭真指着我对少奇副主席说，就是这位新华社记者搞到了赛扬的报告。我想，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少奇同志在怀仁堂门口会认出了我。我据实作了回答。没想到，他立即招呼他的秘书用他的专车把我送到宣武门新华社大门口，等我把文件送到口字楼编辑部后，又送我回怀仁堂开会。

我还不止一次借廖承志同志的专车送过稿件，那是因为廖公是我们的老社长、老首长呀！少奇同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党中央的书记，他派自己的车为新华社记者送稿件，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

周总理支持改进外事报道

在 50 年代，我们外事记者同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有许多接触。当时的外交工作在初创阶段，而外事报道更是在摸索中进行，没有什么章法可循。怎么当好一名外事记者？怎么写好外事新闻？惟一可以参考和学习的榜样是塔斯社。而恰恰在外事报道上，塔斯社的新闻是干巴巴的公报，往往是名单加气氛，很少有实质性的内容。

周总理为外事人员制定十六字守则：“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一守则也是新华社外事记者的守则。几十年来，我们时刻牢记周总理的教导。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华社的外事记者，包括摄影记者，经批准可以直接参加中央领导同志的外事活动，这为写好报道创造了条件。新华社的记者没有发生过违反外事纪律的事件。

外事报道不断得到改进是同周总理的支持分不开的。首先，

为了解决报道中的名单问题，周总理指定有关礼宾专家制定了名单排列的次序。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不同场合哪些人上名单，名单如何排列，这不仅是技术问题，而往往是政治问题。有人说，这是“名单学”，我认为一点都不夸张。有了周总理审定的名单排列次序的原则后，记者去掉了一块心病。

在突破“名单加气氛”的公报式报道的过程中，第一次在外事新闻中引用了总理的讲话就是经总理同意的。后来，中央首长在接见外宾时的讲话内容在报道中逐渐多起来，使外事新闻充实多了。后来，又进了一步。外事新闻突出报道了领导人就国内外热点事件的讲话，甚至作为新闻的导语。这都是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后才这样写的。

周总理在审阅稿件时非常仔细，他连错别字和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都一一改正。

小平同志同意记者的建议

邓小平同志也很关心和支持新华社的工作。每次他接见并送走外宾后，都注意听记者向他朗读写好的稿件，一般都说一声“我看可以”，很少在稿件上签字。偶尔他也提出一二处修改意见。如果他要发表重要讲话并要新华社播发，他往往事先要秘书通知新华社，让记者有准备。

有一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也使我备受鼓舞。1982年9月2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同我国政府总理就香港问题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后，双方同意发表一个简短公报，表明双方有分歧，但认为会谈是有益的，会后将“通过外交途径就香港问题继续保持接触”。

但是，在会谈之前英方私下大肆散布流言蜚语，说中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作了让步。尽管我方已向香港来京采访的记者宣布：中方立场没有改变，但这条消息只供香港记者发表，新华社

不发。所以，外国通讯社仍继续造谣，并认为新华社保持缄默是一种默认。当时，总编室通过内部电话两次指示我，要力争在公报新闻中以某种方式重申我方立场，否则这场宣传战对我不利。

我同另一名新华社记者柴世宽商量后向国务院领导人提出建议，在新闻公报之后加一句阐明我政府立场的背景文字。这样既不违背中英双方关于不透露会谈内容的协议，又可起到辟谣的作用。国务院领导人表示倾向于同意我们的意见，而外交部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不同意。这时，小平同志刚刚陪同金日成主席访问四川回到北京。他已预定第二天同撒切尔夫夫人会晤，所以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小会议室，准备了解双方正式会谈的情况。我随同国务院领导人一起到小会议室。小平同志听完汇报后正在沉思，我拿出写好的稿件送上去给他看。小平同志看后说：“我可以看到。”就这样，小平同志一锤定音。新华社加上去的那一句背景文字是：“众所周知，中国要收回香港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定的。”

姚依林副总理对我的启发

从1950年开始，我分工报道财经工作，重点是向国外介绍人民政府稳定物价和开拓国内市场以打破西方的禁运封锁。我几乎每周都同贸易部联系。姚依林同志当时任贸易部常务副部长，他很重视对外宣传，我时常听他作报告，受益匪浅。他有时还直接向我建议如何向国外介绍我国的物价和市场情况。

有一次，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使我得以深刻理解建国初期我国市场的某些复杂性和特点。他说，江西财委给中央发来一封急电，说南丰蜜橘丰收，国营土产公司大量收购了，可是批发不出去。私商观望，就是不愿立即采购。已降了三次价，还是无人问津。担心积压下去橘子要烂。经请示陈云同志后，中财委发了回电。三天后，江西又来电报，报告橘子全部售完，感谢中央的及时指示。原来，回电指示：停止降价，暂停挂牌半天，然后

逐步提高牌价。

姚依林同志向我们解释说，中国的市场盲目性大，表现在东西越贵，越涨价，越好卖；越跌价反而卖不出去。国营零售网一时建立不起来，依靠私商就得运用市场规律和懂得他们的心理。

当时，英国等西方的一些大商人从香港秘密来京，与我们商谈买卖。这有利于打破禁运封锁。但是贸易部对这些商人的情况不摸底，不知他们打算买什么、卖什么，胃口多大。姚依林同志建议让我用英语采访他们。我以记者身份同他们一起进餐，喝午后茶，多多少少摸到了他们的一些意图。

1950年7月，姚部长接受法共《人道报》资深记者马尼安的采访，指名要我做翻译。他重点谈了人民政府采取措施打击投机倒把，平定了中国历经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使物价逐步稳定；介绍了党对私营经济的团结、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以及开拓国内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发展同东方国家的贸易，挫败西方的封锁禁运。这次谈话非常精彩，马尼安不止一次向我竖大拇指，表示赞赏和钦佩。我整理了谈话记录，曾向社内和有关的对外宣传刊物编辑部传达，听过的人都认为很受启发。这份记录一直保存到今天。

朝鲜停战后，1954年冬，一个促进东西方贸易的国际组织派了秘书长香白朗来中国访问。贸易部召开党组扩大会进行研究准备。姚部长特别指示邀请我列席会议，尽管我当时还只是一名共青团员。

1959年我调到国际部后就很少见到姚依林同志了。“文革”开始时，他任国务院财贸办副主任兼商业部长。他受到商业系统造反派的批斗。我住在甘家口，离北京商学院很近。我去看过批他的大字报。我认为，大字报的论点都是些歪道理，写大字报的人大都不懂财贸工作。

1966年9月，我在西单商场买糖果，忽然听到身旁响起熟悉的声音：“要一斤水果糖。”我回头一看，是姚部长。他示意我

不要出声，并同我点了点头。他走后，两位营业员觉得他有点脸熟，问我：“他是谁？”我笑嘻嘻地说：“是你们的部长呀！”

粉碎“四人帮”后，姚依林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1978年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来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至1983年，我在对外部分工管外事报道。有一次记者回来对我说，姚副总理问起我，还说有机会想见我。几天后，我去中南海紫光阁采访，见到了他。外宾走后，他同我亲切地握手和谈话，并招呼摄影记者拍下了我们俩握手的照片。他告诉我，他就住在新华社后门附近的一条巷子里。我后来应邀去他家拜访，我们谈到了50年代的往事；谈到西单商场那次巧遇时，他爽朗地笑了。临走时，他对我说，他查出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1982年9月姚依林（左一）与作者（中）在中南海紫光阁

“我们是老朋友了”

1986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的同志和我驻埃及使馆的全体成员，在使馆院内列队迎接到开罗进行工作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吴学谦。吴副总理刚迈进院内，一眼看见我，就走过来同我握手，并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进使馆大厅。他指着我对温业湛大使说：“我们是老朋友，认识快40年了。”

我是在1950年夏末第一次见到吴学谦同志，地点在内蒙古的边境小镇满洲里火车站。他率领着庞大的世界青联访华团从布拉格经莫斯科来到这个中国边境小镇。我随团乘专列采访各国青年代表，一路参观东北并到达北京。他给了记者很多采访便利条件。后来，他担任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廖承志兼部长）。1954年国际学联理事会在京召开执委会，我负责报道，对外发了大量的新闻。他曾写信给新华社表示感谢，认为国际学联召开的历届会议中，这次会议的新闻报道最为充分和及时。

我调到国际部东方组时，吴学谦同志正好在中联部先后担任局长、副部长，负责中东这一片，我们之间也时有业务上的联系。

1982年5月的一天上午，我去外交部亚洲司交涉提前取回我国发表的有关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声明。按规定，这个声明晚上7点要对内对外同时播发，但我上午派人去拿时却碰了钉子。考虑到这份文件在播发前要译成英、法、西、俄、阿诸种文字，所以我在下午又去外交部。不巧亚洲司几位司长都不在，日本处的同志对我不熟，不敢给我。我很着急，在楼梯口正在想找哪位副部长才能拿到。忽然，听到有人叫我：“叶周同志，你怎么来了！”我一看是刚到外交部任职的吴学谦部长，我喜出望外，向他说了缘由。他立即同我一起到日本处，为我取到这份文件。这位新上任的外长为新华社解决了燃眉之急。

建国初期我认识了好多位后来外交部的负责人。在80年代，

他们先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我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时曾求助于他们。如有一次，小平同志要会晤美国大使。这次会晤关系到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很重要。但是，礼宾司通知我们，一个记者都不让参加。总编室却要求我千方百计设法派记者参加。我想弄清楚，如果这是外交部党组作的决定，我可以回复总编室说没有办法，否则还有希望。我用保密电话同负责北美事务的韩叙副外长联系。（我在1949年冬曾接受他的委托，代外交部交际科陪同苏联驻华临时代办齐赫文去广州，向我国移交苏联广州总领馆的财产，我还担任他的翻译。所以我很早就认识了韩叙同志。）我在电话中试探性地提出要求，说由于这次会晤的重要性，新华社是否可以增派一名记者参加。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行，新华社只能来一名记者。”于是，新华社就派一名记者参加了这次会晤，我也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曾涛社长问我如何想到用这个办法的。我说，1945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时曾听过经济系陈岱孙教授讲西方的推销术。他说，餐厅侍者不是问“你要不要煮鸡蛋？”因为这样问的结果，顾客可能说“不要。”他问顾客“要一个还是两个煮鸡蛋？”顾客往往会说“要一个吧！”

50年弹指一挥间。每当回忆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的教诲、关怀和帮助，我总是感到作为新华人的自豪和责任。我离休已十多年了，为了不辜负老一代领导人的关怀和期望，一直在努力发挥余热。

叶周：新华社高级编辑，已离休。

外交家翻译家柯柏年

·陶 涵·

柯柏年同志离开我们已有十多年了。本人与柯老共事三年，交往二十多年，特撰此文介绍他的经历、贡献和品德。

—

柯柏年原名李春藩，1904 年生于广东潮州一个制糖业富商家庭。他在潮州读完小学和中学。他的父辈认为，要使孩子们成才，将来不论经商或从政，学好英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父辈出资和督促下，李春藩从小学一年级起，就与兄弟、堂兄弟们在课余时间到离家不远的教堂里向英国和美国牧师学习英语。到他们入高中时，已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笔译能力也不错。

李春藩的堂兄李春涛，早年留学日本时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与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过交往。回国后，他在北京几所大学任教授，向学生宣传过马克思主义。20 年代初，李春涛回到